

推动以人为本的共享发展

——增进人力资本的分配

孙婧芳 张平 邓曲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人力资本是边际生产力的重要体现,高人力资本意味着高的边际生产力、高的劳动报酬。中国高人力资本的规模不到就业人口的一半,教育年限也低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中几乎没有高人力资本群体。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特别是高中教育已经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农村家庭放弃高中教育的理性选择与经济发展所需的高人力资本相悖。在此情况下,增加公共教育支出、降低家庭教育成本成为人力资本提高的关键举措。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起点公平,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减少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凸显公平的收入差距,进而加强工资的信号作用,促使人力资本积累进入良性循环。

关键词: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共享发展;橄榄型社会;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224;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10-0094-08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最终落脚点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在于收入分配的公平。然而,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依然有待进一步改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加之人口结构变化,与之前相比,经济发展条件已截然不同。寻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以及转变收

入分配结构的关键因素将成为实现共享发展的核心所在。

一、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

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本文分别计算了住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三大主体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见文后表1)。总体而言,“十二五”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12年也有了大幅提高。宏观分配格局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当前的分配制度下,宏观分配格局主要是由初次分配决定的。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再分配之后各部门收入份额的变动幅度并不算很大。第二,住户部门所占比重偏低。住户部门的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2—2010年期间,住户部门是再分配的受损者,此后才从再分配中获益。尽管2012年住户部门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依然低于发达国家。在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相近时,美国、日本和英国的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都高于中国。第三,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基本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以后出现小幅波动。2012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为49.3%,扭转了持续下降的势头。

收稿日期:2016-07-13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收入分配政策与制度研究设计”;智库研究项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国家高端智库选题方向和重点课题“新常态下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研究”

作者简介:孙婧芳(1983—),女,副研究员,从事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张平(1964—),男,副所长,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研究;邓曲恒(1979—),男,室主任,研究员,从事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

与宏观收入分配出现改善相伴随的是,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除去少数几个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扩大的趋势。“十二五”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数据年份较少,目前尚无法判断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二是地区收入差距开始收敛。农村和城镇的地区差距都经历了逐渐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要大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三是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得到缩小。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从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2010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2.27倍。“十二五”以来,金融业与制造业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2011年金融业的工资水平为制造业工资水平的2.21倍,2012年和2013年则稳定在2.15倍。

从收入分配的宏观格局和居民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改善的端倪。然而,距离收入公平分配尚有一段距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依然高达0.469。与此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健康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在综合考虑职业、教育、收入等客观因素下,2010年中国16~64岁有职业人口的社会结构呈现为“倒丁字型”。社会底层的比例非常大,尽管相比于2000年,社会底层的比例有所缩小,但并没有改变整体的社会结构特征^[2]。“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群体间的关系处于对立、矛盾或冲突下,存在很强的张力,容易激发社会矛盾^[3]。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和充满张力的社会结构依然值得高度关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收入公平分配是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最终落脚点之一,但是收入分配自身难以实现自我救赎。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共同富裕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具有平等社会地位的劳动者只能以“劳动”为同一尺度进行公平的分配,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生产是分配的基础,只有在保证生产、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公平分配使居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二、人是共享发展的中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的发展,从低收入国家跃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尽管中国经济依然需要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客观要素环境,发展理念也需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被提出。共享发展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发展层面,经济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二是分配层面,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这两个层面都是以人为中心,具体到经济发展的要素中,就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庭为中心。

在新的发展阶段,共享发展的两个层面——发展和分配——都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就经济发展来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发现,以往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与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包括抚养比下降创造的有利于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维持了较高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4]。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减速,这次减速虽然与世界经济整体减速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非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结果^[5]。

经济增长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大量学者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索洛根据资本、劳动以及技术进步来说明增长的来源^[6]。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当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仅仅是适应了人口的增加,但人均收入并没有进一步增长。然而,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劳动生产率被大幅提高,从而可以实现经济增长^[7]。技术进步体现在机器设备改进和人力资本提高两个方面。莎拉伊马丁利用大量实证研究列出来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因素,教育水平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教育水平被转化为更高技能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进入更高水平。索洛增长模型依循新古典经济学,以规模不变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出发点。罗默在生产要素存在正外部性的前提下,以规模报酬递增为背景提出了内生增长模型。教育的正外部性被内生增长模型置于重要的地位,强调人力资本

投资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其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均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初级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8]。舒尔茨在分析报酬递增的源泉时指出,长期来看,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是对人口素质进行投资。对中国GDP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时发现,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2008年期间,在资本存量、劳动力、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诸因素中,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7%;当考虑到不同教育水平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时,人力资本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到38%(Whalley and Zhao 2010)。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最终都将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的结果也为其提供了支持。

其次,就分配来看,虽然中国的宏观分配格局出现了改善,但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宏观分配格局中住户部门的收入比例下降,企业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9];另外,基尼系数尽管在2009年之后呈现出下降趋势,收入分配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依然高达0.469,在警戒线0.4之上,远高于OECD国家的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的经济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与其较大的收入差距不无联系。如前所述,2000—2010年期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出现显著变化,持续处于“倒丁字型”的状态。“十二五”期间再分配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初次分配仍居主导地位。使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主要是在初次分配环节推动下下层阶级不断进入中产阶级。

若将收入看作是职业、教育等各种客观因素的综合反映,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为收入分配结构的变迁,即低收入群体不断地向中等收入群体迈进,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劳动者收入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是微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边际革命的发展,分配理论也被逐渐提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提出,“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10]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边际生产力越高的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也越高。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依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收入,也据此形成了收入分配格局。由此可见,劳动者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或者说是个体特征。

对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教育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重要特征(Mincer,1974)。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从而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然而,与此并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仅体现出“羊皮卷”效应(Spence,1973),教育只起了信号的作用,将劳动生产率高的人通过教育系统将其识别出来。能力比较强的人,学习成本比较低,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学历。为了剔除教育中与能力有关的部分,学者对考虑能力或者是剔除能力情况下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研究(Angrist and Krueger,1991;Ashenfelter and Krueger,1994),依然发现,较高的教育仍意味着较高的收入,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综合影响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收入的因素可以发现,其焦点在人力资本,特别是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作用则更加凸显。中国现在正处于人口一定甚至下降的情况中,经济活动人口自2010年开始呈现出负增长趋势。依据上述理论和实证结果可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源泉;同时也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根基。

三、中国高人力资本群体的规模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收入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人力资本结构也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本文将微观数据与官方数据结合,对中国高人力资本群体的规模进行估计,进而说明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出于研究的需要,学术界自行搜集了一些住户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常规住户调查数据相比,民间数据具有研究指向明确以及公开性强的特点。此外,民间调查往往会围绕研究主题设计一些深度问题,从而能够成为官方统计数据的有益补充。然而,囿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民间调查通常难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广覆盖,需要根据官方数据进行重新加权,以增进样本的代表性。

目前,能够支持本项研究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主要有:中国收入分配调查数据(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数据年份方面,中国收入分配调查数据和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最新数据年份都为

2013年,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最新数据年份为2012年。因此,本文首先从时效性的角度排除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而言,中国收入分配调查完整地覆盖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三大群体,而且样本规模更大,行业和职业等关键变量的应答率更高,更为适合对高人力资本群体进行识别和规模测算。因此,本文采用2013年的中国收入分配调查数据^①把人力资本与行业、职业等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相结合,将高技能劳动者、专业技术人才、中小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新型职业农民界定为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并对其规模进行测算。

2013年收入分配调查的样本规模为61162人,调查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的14个省,抽样设计合理。本文也将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对样本进行重新加权,以进一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收入分配调查数据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职业、行业、所有制单位等工作信息,能够支撑结合就业特征的高人力资本的识别以及规模的测算。

本文首先对2013年的收入分配数据进行权重调整,计算出高技能劳动者、专业技术人才、中小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在样本中的比重,然后分别将其比重乘以2015年末的中国内地总人口(137462万人),从而得到这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的规模。在全部人口中,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的比重为23.72%。而在就业人口中,其比重为42.64%。从规模上看,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总计达32606万人。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与李强和王昊(2014)关于中国2010年就业人口社会结构的分析相一致。高人力资本群体与社会结构中的中上层群体相当,而低人力资本群体则与社会底层群体的规模相当。在六大高人力资本群体中,新型职业农民的规模最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其他五类高人力资本群体则主要集中于城市。人力资本的这种差异也反映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普遍偏低,其收入也较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是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同时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远高于城市地区间的差异。从社会结构来看,2010年中国城市地区社会结构已近似于“橄榄型”,趋向于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然而,农村地区却依然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2]。鉴于此,应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其不

断进入高人力资本群体,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从而为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提供基础。

另外,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本文对六大高人力资本的识别以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为基础,即使如此,其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不到一半。如果参照国际通用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进行划分(George,1994;Hossain,1997),那么高人力资本群体的规模将会大幅缩小,特别是高技能劳动者、中小创业者和新型职业农民的规模。根据已有研究的受教育年限可知,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低于发达国家。201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1.30年、7.20年(Barro,2013)。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知,1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1年,城市、镇、农村分别是10.84年、9.21年、7.57年。由此可见,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提高镇和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则更加迫切。

四、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差异

虽然高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人收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却具有很强的代际不流动性。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则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相对较高。这种代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因为拥有较高教育的父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从而能够为其子女进行更好的教育投资,使其子女也获得较高的教育。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起点和机会不公平,在存在政策倾斜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即使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任何歧视,等量的教育可以获得等量的收入,但是接受教育的起点和机会不公平也将会带来结果不公平。这一方面维持了代际收入差异,另一方面不利于经济活动人口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广泛分享经济、政治机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因为当市场不完美时,权利和财富不平等转化为机会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浪费,资源分配丧失效率,另外经济、政治不平等使制度发展受阻。然而,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城乡之间在公共教育获得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通过公共服务支出增进人力资本分配、实现起点公平是共

^①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为本文提供数据。

享发展的重中之重。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计算得到的农村教育经费占全国的比例可以发现(见文后表2),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获得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全国的一半,小学甚至占到了62.06%。与此相反的是,农村地区的幼儿园和高中获得的教育经费偏低,特别是高中,农村普通高中获得的教育经费仅占全国的14.42%。虽然农村普通高中的教育经费比较低,但是从反映教学条件的生师比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来看,农村高中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十分巨大。本文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计算了城市、镇和农村的在校学生与专任教师的比(生师比),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的生师比均低于城市的水平;农村和镇的普通高中的生师比分别是14.77和15.50,仅略高于城市的14.40(见文后表3)。从城乡之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来看(见文后表4),农村地区尽管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但是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支出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也不是非常巨大。相比而言,农村高中的生均经费支出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购置资产、修建基础设施的公用部分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这反映出农村高中的硬件设施更新的速度相对较慢。另外,幼儿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呈现出巨大差异,农村幼儿教育的生师比远高于城市和镇,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也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述关于城乡、农村与全国的比较数据似乎说明,除幼儿教育以外,中小学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比较均衡,并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倾向。即使在过去存在城乡差异,但是从当前的数据来看,这种差异似乎并不存在。这种较均衡的结果是因为,在现行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体制下,中央编办、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城市、镇、农村的中小师生师比。财政部门根据人员编制划拨中小学人员经费,在《意见》规定下生师比相对确定,由此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自然不存在巨大差异。文后表2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各级教育机构的最主要经费来源,则是对此的有力佐证。

然而,生师比无法反映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教师质量,二是入学率。教师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质量。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都落后于城镇,在事业编制等级工资的制度规定下,农村教师并不比城镇教师获得更多的收入,生均教

育经费支出中的工资支出对其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此外,农村家庭的收入依然低于城市居民,对子女教育进行额外支出的能力十分有限,农村教师除了工资收入外很难获得其他的额外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学历则必然低于城镇教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生师比和生均教育经费的数据都是以在校学生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在入学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在校学生仅是相应适龄人口的一部分,无法反映教育的普及程度。本文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3》中分年龄人口规模计算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年龄阶段的适龄人口数^①(见文后表5),将2012年的各级教育适龄人口数与相应的在校人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城市普通小学和初中的在校人数都高于相应的适龄人口数,普通高中的在校人数低于适龄人口数,相差350多万。这说明部分高中适龄人口退出普通高中教育,流入到职业高中或者是退出全日制教育。但是农村的情况与城市差异显著。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农村学生少、办学条件差的中小学渐渐撤销,并入乡镇中心学校。虽然2004年和2010年对此进行了调整,但是基于2001年的撤销合并措施,本文将镇和农村的相应数据进行合并再比较。村镇的普通小学在校人数略低于适龄人口数,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普通初中的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数之间的差距大于小学阶段的差异;普通高中的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数之间则存在巨大差异,相差2500多万。这说明普通高中在农村和乡镇的普及度远低于城市,普通高中教育已经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除了普通高中教育之外,农村的幼儿教育也当备受关注。农村的幼儿园适龄人口远远高于幼儿园的在校人数,与城市和镇形成了强烈反差。

高中教育普遍会给农村家庭带来较高的成本,同时近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增加了教育投资的不确定性,相反民工荒则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当前收益。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下,农村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外出打工,而非就读高中。然而,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研究

^① 此处小学、初中、高中适龄人口数仅仅是按照年龄进行了加总。由于学籍制度,在校学生的年龄可能与人口统计中的年龄存在差异。如果假设在校学生的统计时间与人口统计的时间相同,则这种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对未达到学龄的人口按照月份进行的剔除与超过学龄的人口按照月份进行的补充相一致。

显示,在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比较低,更容易遭遇失业^[11]。农村家庭在当前成本收益比较下的教育投资决定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求并不一致,同时不利于高人力资本群体的增加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更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失业。针对家庭选择的失灵,特别是农村家庭,政府应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强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以增加公共教育支出的方式降低教育成本。依据在校人数和适龄人口数的比较可知,高中教育的公共服务支出应该进一步加大,针对农村普通高中的财政支出应大幅提高,降低高中就读成本,逐步实现高中义务教育。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裕。然而,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结构存在很大张力,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需要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源泉,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将这个源泉落脚在人力资本上,通过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为技术进步提供基础。正如舒尔茨所说,研究开发的工作能够带来较高概率的规模报酬递增。与保持经济发展并存的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使其转向“橄榄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经济发展将主要按照新古典的方式推进。在新古典理论下,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大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者边际生产力或者是工资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关键变量是人力资本。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和分配对共享发展来说,犹如门之两柱,实现共享发展也当以人为本。

然而,中国的高人力资本群体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不到一半,受教育年限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乡镇和农村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偏低。从职业分布来看,高人力资本群体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农业中几乎没有高人力资本群体。这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结构相吻合。在高人力资本集中的城市,其社会结构表现为“橄榄型”;而在几乎没有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则表现为典型的“倒丁字

型”。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教育资源配置具有密切联系。尽管城乡之间在生师比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方面的差异较小,但是各级教育的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数之间的差异在城乡之间则迥然不同。普通高中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当前劳动力市场背景下,农村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进城打工,而不是就读高中。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的这种理性选择却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高人力资本相背离。鉴于此,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式降低教育成本,使家庭的教育选择与经济发展所需相一致。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起点公平。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得到了全面普及,但是农村的普及度低于城市,同时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与城镇存在很大差别。随着义务教育“两为主”政策的出台,农民工随迁子女获得了在打工地上学的机会,然而囿于地方财政等方面的限制,他们仍然难以获得与城市家庭子女相同的受教育机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家庭子女能够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将能提高其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收入的能力。同时,增加对普通高中教育的财政支出,逐步实现高中义务教育或者是免费教育,也将降低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打破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

尽管教育具有极大的外部性,但是不同教育阶段的外部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按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教育的社会回报率逐渐降低。因此,推进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均等化的投资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确保起点公平的同时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回报率。另外,对早期幼儿教育进行投资,获得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相对于义务教育而言,中国幼儿教育的差异更大,农村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农村留守儿童不仅缺少来自学校的幼儿教育,同时也缺少来自家庭的教育。即使在城市,幼儿教育也是良莠不齐,公立幼儿园的供给不足以及分配不均,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小孩难以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小孩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此,应大力发展幼儿教育,并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促进农村、落后地区以及城镇低收入家庭幼儿的早期智力发育,同时可以获得高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起点公平有助于缩小代际差异,推动代际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地位转换。

二是增加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提高劳动力

获得再教育的机会。囿于以往城乡教育上的差异,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不同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差异比较大。通过培训提高当前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技能,给予其获得再教育的机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低的人力资本,缩小差异。技术工人群体的规模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不到20%,以职业培训等方式增进当前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分配,无疑有助于提高技术工人的比重。相比于正规教育,职业培训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有助于减少结构性失业,实现就业稳定。

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确保过程公平。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最终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实现。为此,应打破因户籍制度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就业岗位获得上的歧视,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凸显因个体特征差异带来的公平的收入差距,使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呈现对等局面。目前,农民工规模已经超过就业人口的1/3,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同就业岗位上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在就业岗位获得上依然存在较强的歧视,难以进入公有制单位就业。除了城乡差异外,由垄断带来的歧视也不容忽视,促进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必须要完善招聘和用工制度,斩断垄断性行业高收入与寻租行为之间的链条,依据效率配置劳动力资源,杜绝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邓曲恒,张平,孙婧芳.“十三五”时期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2] 李强,王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J].社会科学战线,2014(9).
- [3]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
- [4] 蔡昉.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J].经济动态,2016(4).
- [5] 陆旻,蔡昉.人口结果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
- [6] SOLOW,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 [7] SOLOW,ROBERT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320.
- [8] PSACHAROPOULOS.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J]. World Development,1994,22(9):1325-1343.
- [9] 魏众.2000—2011年中国宏观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分析——基于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动态,2014(11).
- [10]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1] 孙婧芳.低学历劳动力面临的就业危机——以江苏省城镇为例[J].劳动经济研究,2013(1).

表1 住户、企业、政府三大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

年份	初次分配			再分配		
	住户	企业	政府	住户	企业	政府
2000	67.15	19.72	13.13	67.54	17.94	14.53
2001	65.93	21.40	12.67	66.07	18.92	15.01
2002	64.49	21.57	13.94	64.43	19.34	16.23
2003	64.09	22.28	13.62	63.97	19.94	16.09
2004	61.14	25.12	13.74	61.05	22.51	16.43
2005	61.28	24.52	14.20	60.84	21.60	17.55
2006	60.73	24.74	14.53	60.25	21.54	18.21
2007	59.61	25.65	14.74	58.89	22.10	19.01
2008	58.66	26.61	14.73	58.28	22.74	18.98
2009	60.69	24.73	14.58	60.53	21.19	18.28
2010	60.50	24.51	14.99	60.40	21.19	18.41
2011	60.67	23.95	15.38	60.78	20.03	19.19
2012	61.65	22.73	15.63	61.99	18.47	19.54

资料来源:邓曲恒、张平、孙婧芳,2016,《“十三五”时期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表 2 农村教育经费占全国的比例

学校类别	合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	社会捐赠经费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幼儿园(千元)	175 805 370	86 237 156	4 002 055	300 034	82 030 577	3 235 548
农村占比(%)	37.96	41.27	39.23	28.61	34.88	27.13
普通小学(千元)	795 089 406	764 184 749	2 874 345	1 216 993	2 077 3901	6 039 418
农村占比(%)	62.06	63.30	43.82	55.04	24.85	43.11
普通初中(千元)	515 664 314	488 232 271	2 369 753	981 249	19 449 158	4 631 883
农村占比(%)	53.87	55.62	37.11	38.64	17.02	36.03
普通高中(千元)	322 626 836	249 962 308	1 202 119	1 072 785	65 068 790	5 320 834
农村占比(%)	14.42	14.22	57.14	20.06	14.51	11.98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14》

表 3 城乡之间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生师比

	在校学生数(人)			专任教师数(人)			生师比(教师=1)		
	城市	镇	农村	城市	镇	农村	城市	镇	农村
幼儿园	13 175 629	14 978 832	10 792 442	1 423 614	958 790	444 349	9.26	15.62	24.29
普通小学	27 729 719	33 705 362	32 170 406	1 293 251	1 742 138	2 061 245	21.44	19.35	15.61
普通初中	14 300 203	21 955 710	8 145 335	1 046 324	1 703 507	731 148	13.67	12.89	11.14
普通高中	11 144 953	12 398 955	814 909	773 716	800 126	55 166	14.40	15.50	14.77

注: 幼儿园的专任教师数为教职工数, 小学、初中、高中为专任教师数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3》

表 4 城乡之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比较 单位: 元

	合计		个人部分		公用部分		基本建设	
	全国	农村	全国	农村	全国	农村	全国	农村
幼儿园	6 516.85	4 225.08	2 987.84	1 607.53	3 362.41	2 453.68	166.61	163.86
普通小学	8 407.01	8 159.06	5 439.16	5 484.07	2 839.86	2 553.42	127.99	121.57
普通初中	11 461.55	11 002.97	6 952.46	6 819.38	4 219.70	3 912.05	289.39	271.54
普通高中	12 909.53	11 023.33	6 927.26	6 300.57	5 673.92	4 540.10	308.36	182.65

注: 个人部分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两部分; 公用部分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两部分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14》

表 5 城乡各级教育适龄人口数 单位: 人

	在校学生				适龄人口			
	城市	镇	农村	镇+农村	城市	镇	农村	镇+农村
幼儿园	13 175 629	14 978 832	10 792 442	25 771 274	11 468 111	11 198 556	26 522 262	37 720 818
小学	27 729 719	33 705 362	32 170 406	65 875 768	19 993 983	20 058 965	46 356 197	66 415 162
初中	14 300 203	21 955 710	8 145 335	30 101 045	10 445 247	10 206 980	23 310 469	33 517 449
高中	11 144 953	12 398 955	814 909	13 213 864	14 832 732	13 889 290	24 580 024	38 469 314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3》在统计年鉴中, 此数据为抽样绝对数, 本文根据抽样比例 0.831% 对其进行调整

[责任编辑: 房宏琳]